

疯狂的金钱

● [英] 苏珊·斯特兰奇 著

● 杨雪冬 译

—— 当市场超过了政府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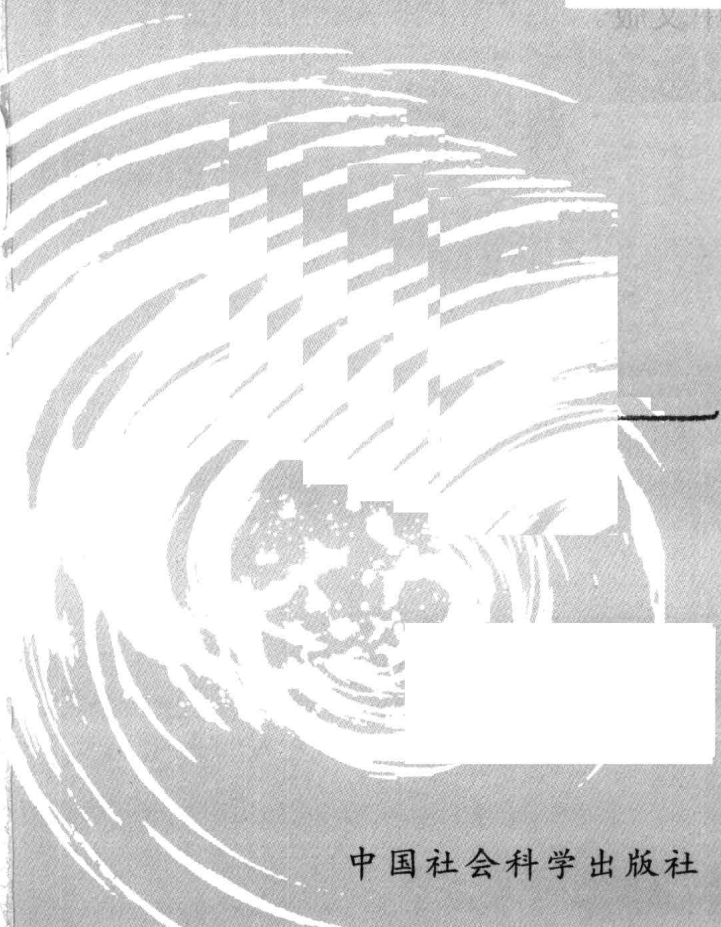


◆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 亚洲金融危机的最早预言者
◆ 继《赌场资本主义》之后又一部最新力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疯狂^的金钱

● [英] 苏珊·斯特兰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362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疯狂的金钱 /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11

(翻译丛书)

书名原文: MAD MONEY

ISBN 7-5004-2641-0

I. 疯… II. 斯… III. ①金融危机-研究-世界②金融市场-预测-世界
IV. F8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7971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 233千字 印数: 1—4000册

定价: 19.00元

金钱的政治经济学

译者序

1986年，素以严谨著称的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在目睹了令不发达国家痛苦不堪的债务危机之后，大胆地预言在2000年的千禧之日全球将爆发一场更为酷烈的金融危机。那时，高举香槟欢庆的是从金融投机中暴富的少数交易商和经纪人，而大多数人则眼看着自己多年积攒下的财富一夜间付之东流而重陷贫困交济。不幸的是，由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斯特兰奇预言的这幅画面在1997年提前出现了。由投资基金引发的金融危机首先在已经欣喜了近30年经济持续繁荣的东亚和东南亚登陆，把曾经雄心勃勃的“小龙”、“小虎”们搅得狼狈不堪，然后又向俄罗斯、南美洲的巴西以及西欧蔓延，各国政府一片恐慌，而后“布雷顿体系”所依赖的几大支柱：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也不知所措，难以及时提供对策。不顾社会政治后果，狂热地追求巨额利润的资本投机本性在这场危机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二战后，乃至冷战后流行起来的各种笃信资本“被驯服”或者“全球化为世界开太平”的观点现在看来似乎是痴人说梦，而日益痴迷数量化的经济学以及不断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蚕食和毒化的

社会科学给出的回答也显得苍白，有意无意地掩盖了金钱背后隐藏的各种不平等以及冲突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段话在这里非常合适：“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是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都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IPE）这门新兴学科创始人之一，斯特兰奇教授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东亚危机之后完成这本著作的。她说，国际关系领域由于长期受行为主义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建立起预测模型就可以把握国际关系的前景。这种误导使许多学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烦琐而且呆板的数据之中，忽视了历史以及真实多彩的世界，因此，“包括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历史是知识分子傲慢自大的必要解药”，对于经济学家尤其如此。

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多种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和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问题是斯特兰奇教授在 40 多年学术生涯中始终追求的目标。1970 年，她在《国际事务》杂志发表了《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文，最早明确提出要从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强调改革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和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吸取发展经济学、经济史等学科的成果，避免用数量化的模型来简单地解释并武断地预测复杂的国际事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身体力行，一方面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先后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生院以及英国的瓦威克大学（Warwick）执教，与同事一起为完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建设努力工作；另一方面还积极参加学术活动，著书立说。她参与创建了英国国际问题学会，

历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顾问、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斯特兰奇教授著述甚丰,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英镑与英国政策:从政治角度对一种衰落的国际货币的研究》(1971),《赌场资本主义》(1986),《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1988年版,1994年第二版),《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与斯托普福德合编,1991),《国家的退却:世界经济中的权力消解》(1996)等。

《疯狂的钱》是斯特兰奇教授的最后一部著作。令人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不久,她就永远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桃李园地,终年76岁。在书中她延续了自己思路清晰、观点明确的一贯风格,为我们生动讲述了围绕金钱势力增强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的故事。在斯特兰奇教授看来,不断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将是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首要问题,而且也是其他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金融已经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

虽然采取的术语也许不同,但是无论是哪种经济学教材都不否认金钱逐利的本性:只要有可能,资本就会突破所有约束和障碍占领利润最大的空间和领域。简单地说,二战之后的资本扩张是以两种方式实现的。一种是空间的延展,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驻足过的脚印,并逐步被纳入世界市场经济以及全球金融体系之中;另一种是领域的深化,金融创新使资本真正实现了全球共时流动,并且可以脱离实体经济毫无顾忌地加快自己的流动速度,瞬间实现价值的成倍增长。如果随便翻开一本关于国际经济学的书或者文章,你都可以发现详细而且对比鲜明的历年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金钱在全球扩张的深度与广度。显然罗列数据不是本书的目的。既然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资本全球化的冲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深切感受到全球化

的负面影响，那么揭示这些数据背后发生的政治社会变革以及资本全球化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实际上更有价值。

虽然一直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依然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占据主导性比重，但是这并不说明资本向非西方国家的流动模型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资本流动的空间变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 1997 年的危机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这个近 30 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二战后资本流动的恢复实际上是在美国的霸权支撑下，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的目的而实现的。为了遏制苏联集团的力量，美国在西欧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大陆上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军事援助。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资本流动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官方提供的。60 年代以后，私人资本也加入进来。但是由于两大集团的对峙，这些资本流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主要集中在有美国的“后院”之称的中南美洲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外国资本通过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原材料以及初级农产品，把它们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之中，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具有了内在的脆弱性，一旦经济体系出现变化，首先遭殃的就是这些弱者。80 年代的债务危机集中体现了这点。在危机中，发达国家并没有像列宁预言的那样因为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而发生战争，反而验证了考茨基的观点：帝国主义要维持一个稳定而且开放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共同利益将导致大国之间集体干预当时依然是殖民地的国家。发达国家并没有为债务国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反而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个案方法。债务国由于相互之间集体行动能力的不足，无法在谈判中为自己争得本属于自己的利益。

随着世界政治中战争因素的减弱，经济增长成为了各国主导

战略。对于渴望着经济繁荣、政治合法性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现在面临的最激烈竞争来自昔日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战友们。由于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产品结构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呈水平而非垂直分布，彼此之间缺乏互补性和相互替代性，因此必须为了争取外国资本、技术以及市场来不断向发达国家的资本作出让步并且相互竞低条件。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恶性竞争，实际上导致了它们的出口产品价格的恶化。对于主要依靠这些出口赚取外汇的国家来说，这实际上上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对 30 年代大萧条的许多研究，都承认当时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恶化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

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0 年代肯定目睹了这样一个总体性趋势：各国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正统理论，并且遵循着它提供的政策措施。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对政治主张以及职业观点的牢牢控制肯定是从 80 年代向 90 年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们把西方国家的繁荣简单化为自由主义成功的典范，虚构了“自由化 = 经济增长”的公式，同时对发展中国家软硬兼施，迫使各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政策优惠并且不切实际地过快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均质的，在自由化时序、制度结构和取向、国内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导致了在发展中国家中形成了几个可以集中吸引资金的“漏斗”地带——所谓的新兴市场，例如东亚、东南亚以及南美洲的部分国家。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它们依然在吸引资金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曾经被认为将是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原苏东国家被“大爆炸”式的改革弄得焦头烂额，而且西方也没有像战后那样实行类似的

“马歇尔计划”。因此这些“漏斗”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是资本空间扩张的最后边界,在这些地区投资获利最大。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由于金融创新,80年代以来资本的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投资于实物经济的直接投资外,在全球资本流动中比例越来越大的是各种以投机为目的的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受空间的限制很大,并且没有投资基金行动灵活,赢利迅速。因此,这些“漏斗”地区也逐渐成为势力越发强大的投资基金最青睐的地方。

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东亚和东南亚就是这样的投资“漏斗”。在这两个地区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危机爆发之前,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迅速并且积极推行自由化措施。墨西哥为了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开放了自己的外汇市场,为美国资本的“套利”行动提供了机会。而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泰国也过快地开放了外汇市场。这些措施造成了大量外国资金涌入、国内股市繁荣的假象。原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理论家杰弗里·萨克斯早在1996年的一项研究中就指出,新兴市场在自由化之后容易出现两种假象:一是认为经济自由化之后货币坚挺的原因是自由化,而不是追逐高回报的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启动了房地产价格以及非贸易商品与服务的泡沫,一旦泡沫破裂,股票下跌的时候,货币也开始贬值;另一个假象是认为国内银行从解除管制中获得的自由是无风险的,而实际上从国外借款并在国内泡沫经济中投资非常容易受到本国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各国政府或者忽视了这种现象的潜在危险,或者不愿意正视被长期繁荣掩盖的制度缺陷,因此在行动显得迟钝盲目,这实际上损害了市场的信心,直接导致了恐惧心理的多米诺效应,整个经济的信用维持和创造能力被大大削弱。所以一旦这些短时间流入的资金在套利成功之后

大规模向国外转移的时候,政府面临着洪水溃堤的巨大危险。这正应验了凯恩斯在 30 年代大萧条之前提出的警告:“我们对政治家所不满的,不是在于他们在政策上的不能始终一贯,而是在于他们的顽固不化,他们只是命运的解释者,而不是主宰者。他们的任务是就既成事实加以记录。”(《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2 年,第 89 页)

在金融领域,犯类似错误的不仅是政治家,还有“商学院、经济理论家以及政治学家”。商学院向学生传授的只是融资的专门技术,没有让他们理解为什么在融资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给金融体系和单个企业带来了什么风险?而且到处泛滥的哈佛个案研究方法把重点放在了制造业,而不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经济学家痴迷于交易成本问题,忽视了作为市场经济决定因素的技术发展,即便有人关注技术创新,但集中在制造业,特别是工业所依靠的交通和通讯体系的创新上,很少注意银行使用的技术创新、金融交易创新以及银行本身的创新。至于政治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他们对于金融事务的细节问题了解的更是有限,而且兴趣不大。这些都造成了政府、公众无论在认识上还是行动上都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

金融创新包括三种形式: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以及程序创新。这三种形式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而创新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孜孜追求。衍生品的发展、借力购并以及疯狂炒作垃圾股事件的出现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利润的巨大诱惑力和驱动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1996 年的统计,在 10 年之前,全球衍生金融市场与其他国际资本市场相比,不仅规模小而且没有充分发展。此后,场外交易与场内交易的衍生品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40%。而 80 年代在美国发生的几起借力购并和垃圾股事

件事件给我们展示了金钱贪欲引发的人间悲喜剧。KKR 公司和 DBL 公司依靠美国金融管制中的漏洞，在短短几年中从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成为华尔街上的风光客。KKR 公司在起家时只有 12 万美元的合伙资本，但是到 80 年代管理的公司购并价值达到了 600 亿美元。它们衰落与兴盛一样像彗星般迅疾。由于它们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例如 KKR 公司在 10 年的借力购并中造成了 9 万人失业，美国政府不得不收紧管制，但事实证明这样做已经为时已晚，金融的势力越来越大。

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还与犯罪集团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为后者提供洗钱的渠道。特别是在号称税收天堂的国家或者地区，银行更是凭借为客户严格保守秘密，提供更便利的服务为非法赃钱大开其道。据联合国和“金融行动目标力量”估计，从 70 年代到 90 年代，全球海洛因市场增长了 20 倍，可卡因市场增长了 15 倍。每年的纯利润可能在 1200—1500 亿美元之间。而其中相当比例是通过银行转变成合法收入，并且投资于合法产业的。瑞士、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塞浦路斯、巴哈马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卷入了这种洗钱活动。银行这种被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信用（信誉）化身的组织实际上正在滥用社会对它们的长期信任，由于抵制向政府和公众公开必要的资料，削弱了政府对之实行的监管，实际上以为客户保密为借口使对社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退化为完全听命于个人利益的驱使。当然，银行这种服膺私利的行为并不新鲜。最近几年曝光的瑞士银行在 30 年代替纳粹德国储存黄金的事件就是一个例证。

二战后大部分金融创新是从美国开始的，然后扩展到伦敦、东京等地。而且许多创新是在 70 年代出现的。当时越南战争导致了通货膨胀，尼克松实行了美元贬值，实行浮动汇率。这些变动导致了价格和汇率的频繁变化，经营者为了避免风险、赚取利润不断创

新。银行开始涉足新的服务领域,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侵入银行的服务领域。但是“没有美国政治当局的同谋(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它们的创新和技术就无法为自己带来丰厚利润,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变化”。

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没有过多地重视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其制度的漏洞以及为了补救对金融创新所做的让步。而正是这些政府行为赋予了一系列创新合法性,并且为它们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例如,为了解决 70 年代出现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s)对银行的冲击,198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根斯特—杰曼法案”,允许银行提供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MDAs),以此为银行提供与包括建立证券机构在内的非银行机构公平竞争的条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项法案对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竞争起到了作用,但是也鼓励了非银行机构的发展,实际上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美国不仅是众多创新的起源地,而且也是创新的最大收益者。借助创新,美国大量的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目标和领域,并且在绕过政府管制上更加灵活。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在金融管制上为后来者设置了一种“管制陷阱”:一方面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了金融管制,这不仅起到了规范国内资本投机行为,防止更大的风险出现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机资本向国外转移,实际上起到了转移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本国资本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诱逼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制度情况和实际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管制上的严重不均衡。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蜂拥进入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图的国家 and 地区。而一旦攻击得手,就会趁对方来不及反应迅速撤离。90 年代出现的几

次金融危机无一不是这样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以及大量私人资本合谋发动了危机,在几乎一夜之间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以“体面”的形式掠夺而去。1997年危机之后,东南亚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经济的停滞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股市红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资本投资的获利者把问题的原因完全归结给受伤害者。这颇有些强盗逻辑的味道。但是,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精密的统计,任何有常识的人都懂得,在全球资本流动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获益必然是以另一个国家的损失为代价的。

批判资本投机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本流动的合理性,更不是呼吁回归封闭经济的状态,而是提醒各国政府以及公众不要被“资本神话”所迷惑,只注意金钱的眩目和虚幻的繁荣,忽视其背后的危险与凶残。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业已形成的世界市场经济来说,资本的重要性无异于血液之于身体。但是如果不时警惕血液发生了感染以及其他病变,那再强壮的身体也会受到威胁,甚至危及生命。对于世界市场经济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个不断复杂庞大的综合体至今还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医生,相互独立的各国政府以及受局部利益控制的国际组织在诊治病症和监控病情上基本上都是游方郎中的水平,有的不过是乱施虎狼药的蒙古大夫。

现在全球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是日益统一的经济与建立在领土分离基础上的政治管理。这种经济上的统一与政治上的分裂直接造成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不协调和不对称,资本投机有了更大的机会。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表明,只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实现了协调,才能保证经济的繁荣以及经济的有序发展。在过去数百年中,市场经济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主要是因为领土国家与国内市场在地理界限以及管理能力上实现了和谐和统

一。以领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保证了国内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跨国、跨地区、乃至全球性贸易、资本、劳动力流动在数量和广度上的发展,这种长期维持的和谐关系难以维持。而资本借助世界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金融创新,不仅克服了空间扩张的障碍,而且克服了时间的限制,形成了虚拟经济超越了实物经济的局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拘泥于领土范围的国家以及局部性的国际组织的管理能力。

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两个基本的主体:最后贷款人以及管制者。前者维护公众、企业等对金融体系的最终信心;后者惩罚和防止干扰金融秩序,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国内金融体系中,这两个主体实际上就是国家,并且实现了较为合理的统一。但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还没有一个可以把这两种基本功能承担起来的主体。既没有所谓的世界政府,也没有类似的国际组织。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各国协调相互的行动,在防范金融风险上采取共同措施;另一种是加强现有的国际金融管制措施,特别是强化并完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能力,把它们发展成类似于全球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的组织。

从理论上,这两种选择都有可行之处。但是必须考虑到它们所涉及到的问题。就第一种选择来说,如何协调各国的行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各国协调行动至少面临下列困难:第一,在谁充当领导者、救援基金提供的比例分配、如何使用这些基金等诸多问题上各国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被斯特兰奇称为国际金融体系政治基础的美日关系、法德关系实际上并不和谐。美日的贸易摩擦是两国相互猜疑、相互不信任的集中表

现。而法德在谁将主导欧洲统一大业上竞争的不可开交。这些被认为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常常在危机爆发时并不积极，因为相互讨价还价而延误了解决的时机。30年代的危机是从奥地利的信贷银行破产开始的，而英、法、美等国出于各自的考虑并没有提供及时而且充足的资金。从而诱发了一场席卷世界的大萧条。在1997年的亚洲危机中，日本这个大国邻居扮演的角色也并不光彩，不仅没有积极提供帮助，反而推动日元贬值，颇有些落井下石之味。对于它们来说，只有等到危机殃及自己的时候，才会采取措施，而这时候往往危机已经病入膏肓了。

第二，各国合作遇到的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制度之间的差别。而且与此相关的是各国历史、文化、国内利益格局等其他方面的不同。因此如何去异求同变得非常重要。在斯特兰奇看来，虽然研究这种差别是比较政治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内容，但似乎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充分的理解。之所以这样可能因为美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在学术界处于统治地位，它经常假设世界的其他国家可以模仿美国的体制，或者它们早晚会这样做。各国的情况表明，首先在管制体制以及机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次国内政治以及对外政治也有所不同。“因此要建立一种可操作的体制，必须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各种政治派别之间进行讨价还价并达成协定”。至于被认为是理想模式的美国体制，虽然能够消除许多缺陷以及冲突，但不一定说明它是一种好体制。因为美国能够比其他国家避免一些危险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其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实力。

第三，在现有体制下，各国的合作实际上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主要是由它们的经济实力以及管制体制优势决定的。但是二战以后的危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解决危机中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该得到优先的考虑。实际并不是这样,西方国家或者无视这些国家的利益,或者武断地把危机的原因完全归罪给这些国家内部,然后把自己的一套体制强加给这些国家。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被许多人视为惟一可以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国家——美国。金德尔伯格在 70 年代提出的“霸权稳定论”,不过是把国家在国内的地位与作用搬到国际上了。然而,即便是作为冷战后惟一的霸权,美国的行为也并不是理想化的。最近亨廷顿、小施莱辛格等著名学者都在批评美国行为的霸道之处。实际上对于美国这个夹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大国来,其国家利益才是最根本的。用斯特兰奇的话说,“美国所有领域的政策(不仅仅是金融政策)在本质上都是国内政策。决策一直是针对国民情绪、国内问题以及国内各种利益做出的。美国历届政府至今还不善于考虑它们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影响他人的。”无论是在 30 年代危机中还是在世纪末的亚洲危机中,美国都没有及时发挥“霸权稳定”的作用。另外,美国现在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起这种稳定的作用依然是一个疑问。

在第二种选择中,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寄予了厚望。但事实表明它们还缺乏承担起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重任的必要素质和能力。国际清算银行被认为是中央银行家的银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30 年代,但是直到 70 年代才参与到私人银行的管理中。长期以来,国际清算银行一直致力于制定各国中央银行都遵守的共同规则,并没有重视明确它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巴塞尔协定”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尽管国际清算银行在制定共同规则方面竭尽所能,但是收效不大。到 1996 年,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资本充足率规定的失败。实际上也放弃了建立银行监督共同标准的整个思想。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权威以及

威慑工具来强制这些规定的实施。1997年4月,它公布的“25条银行有效监督核心原则”,希望各国中央银行根据本国的利益向自己的商业银行推荐这些标准。在斯特兰奇看来,国际清算银行今后“要成为一个论坛,一个为中央银行以及其他机构提供全面信息的中心,而且要逐渐成为把新兴市场脆弱的银行体制纳入协商范围的工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亚洲危机中最有争议的对象,不仅受到了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的批评,而且也令一些西方国家不满意。虽然有一些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发展成为全球的最后贷款人,但这并不现实。许多学者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有过于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色彩,其解决危机的措施常常不顾社会政治后果。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必要的技能以及强制力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依然是一个疑问。另外,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政治经济基本的活动主体,主权观念依然坚实的条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无法取得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地位和权威。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进行的选择实际上是追求更公平、更稳定的经济发展还是财富创造的最大化;是推崇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发展的质量。这些选择并不单纯是技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而政治选择又是由人们的经验形成的。在下一个世纪,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民族国家的传统权威无法满足管理疯狂的金钱的需要,而国家在本能上不愿意把这项工作交给不经选举的、不负责任的(经常自高自大、目光短浅的)各种官僚。

然而,选择上的困难不能成为犹豫不决和无所行动的借口。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是一个关乎到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巨大问题,其紧迫性远远超过了环境问题。因此,不仅需要各界人士达成共识,